

热依汗·卡德尔 著

《福乐智慧》 与维吾尔文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Kudatku Bilik and Uyghur Culture

责任编辑：黄爱民

封面设计：江河水



ISBN 7-204-07051-8



9 787204 070510 >

书号：ISBN 7-204-07051-8/C·124

定价：20.00 元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文化

热依汗·卡德尔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呼和浩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文化/热依汗·卡德尔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11

ISBN 7-204-07051-8

I. 福... II. 热... III. 长诗—文学研究
IV. I 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7407 号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文化

热依汗·卡德尔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204-07051-8/C·124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产生于回历 462 年（公元 1069 ~ 1070 年）的长篇诗著《福乐智慧》，是维吾尔喀喇汗朝时期的作品，全诗长达 13000 余行，用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写成。它虽成书很早，但是直到近代亚洲的考古学说和语言学兴起以后，才陆续发现它的手抄本。从 19 世纪以来，《福乐智慧》成为研究维吾尔文化历史及中亚突厥文化历史的重要资料，吸引了众多的中外研究者。对《福乐智慧》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研究工作已逐渐趋于系统化、科学化。

《福乐智慧》兼收并蓄的文化学术风格，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变异特征，引起了学者们对这部繁博宏富的著作多元文化风格的重视。但是，人们过多注意的是它所受的世界文化影响和中原文化影响，对维吾尔民族自身文化却缺乏系统的阐释，忽略了维吾尔民族自身文化对《福乐智慧》的产生所起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影响作用。结果是，虽然将《福乐智慧》置于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总进程之中，并从中认识到《福乐智慧》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却无意间淡漠了它所流溢着的强烈的维吾尔族文化意识，忽略了它的维吾尔族文化流变积淀的过程，使人感觉《福乐智慧》仿佛横空出世，仿佛是无根之树。

《福乐智慧》不是维吾尔文化史上突如其来的文化舶来品，而是维吾尔民族文化发展积淀的必然结果。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植根于其民族文化的土壤，任何民族文化的成果都是其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只有把《福乐智慧》放在维吾尔文化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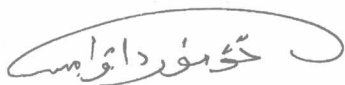
中去考察，才可充分展示其在维吾尔文化历史发展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才能把握《福乐智慧》所表现的对民族文化希冀与探求的轨迹，并透过此去感悟作者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存的忧思。因为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呕心沥血著书立说，绝非仅仅向当权者设计治国之术，更是秉承先祖之志，完成自漠北回鹘汗国几百年来维吾尔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重构民族文化大业、实现强盛民族的宏伟理想。

《福乐智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维吾尔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许多代维吾尔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文化硕果。它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上，集中而具体地体现了维吾尔文化学术思想，因而确立了其在维吾尔文化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维吾尔青年女学者热依汗·卡德尔同志多年致力于《福乐智慧》的研究，并多次到国外与国外的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对《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文化的渊源关系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讨，她的这部专著，正是她的研究成果的体现。我相信，这不仅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更会对《福乐智慧》的研究起到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推动的作用。

维吾尔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在历史上为中华文明作出了自己卓越贡献。深入探讨和研究维吾尔文化，不仅可以增强维吾尔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更使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到充分体现。

铁木尔·达瓦买提



2003.11.10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发现《福乐智慧》	(1)
谁唤醒了沉睡中的《福乐智慧》	(1)
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	(11)
两位法国东方学家	(17)
有关维也纳本的基本情况	(24)
维也纳本在《福乐智慧》研究中的地位	(27)
《福乐智慧》是怎样的一部书	(34)
喀什噶尔在召唤	(37)

第二章：《福乐智慧》创作的时代背景	(42)
史料难详的作者	(42)
灾难深重的多事之秋	(48)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56)
危难当头，强敌压境	(63)
突厥族人意欲争锋	(67)
中亚突厥化及维吾尔人的作用	(75)
世界文化学术思想背景	(84)

第三章：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矛盾人生	(93)
立身济世的人生追求	(93)
人生过客的摇落之悲	(101)
寻觅归宿的山情逸魂	(109)
第四章：一脉相承的维吾尔文化改良	(116)
漠北文化改良的继承和发扬	(116)
孜孜以求稳定祥和的生活	(125)
从碑刻铭文到书面记事	(140)
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	(152)
第五章：寻求幸福之路	(160)
幸福之路的迷雾	(160)
幸福之路的正途	(168)
幸福之路的寻觅	(178)
幸福之路的通行	(185)
幸福之路的归宿	(190)
第六章：净化民族的灵魂	(196)
万物有灵的萨满教	(196)
光明至尊的摩尼教	(205)
苦海无边的佛教	(221)
真主独一的伊斯兰教	(228)
第七章：《福乐智慧》与《庄子》	(238)
引子	(238)
福祸无常的人生之苦	(239)

避害全生的求生之道	(247)
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的生命之道	(256)
 第八章：《福乐智慧》与古希腊文化	(265)
《福乐智慧》与《理想国》	(265)
《福乐智慧》与《政治学》	(271)
《福乐智慧》与《善的城邦》	(277)
 第九章：比喻与象征的艺术风格	(284)
感性文化与诗体语言	(284)
情感外化与景物关照	(294)
启迪效应与象征的艺术风格	(302)
后记	(310)

第一章

发现《福乐智慧》

谁唤醒了沉睡中的《福乐智慧》

当成吉思汗的子孙分崩离析各自称王，逐渐丧失蒙古帝国昔日辉煌的时候，帖木尔家族乘机在中亚河中地区割据一方，建立了帖木尔帝国。帖木尔（1336~1405年）的父亲是察合台汗国的封臣，随着察合台统治家族的衰落，帖木尔在14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最终控制了察合台汗国。他死后，他的第四子沙哈鲁即位。^①令人畏惧的帖木尔的这位儿子尽管性情温和，却是英明的统治者和勇敢的战士，他仁慈、谦虚，热爱波斯文学，极力使自己成为诗人、艺术家的保护者。在他统治时期（1407~1447），他将帖木尔帝国的首都从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迁到呼罗珊地区的阿富汗赫拉特城，这里是波斯人和突厥人角逐的地带。沙哈鲁将赫拉特作为都城，有他的考虑，既可以在这里汇集波斯人、突厥人不同的文化，增进他们之间相互了解，减少因彼此的冲突而可能给帖木尔帝

① 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4页。

国带来的麻烦；也可以通过利用这些民族的矛盾，达到巧妙控制他们的目的。沙哈鲁这种一箭双雕的计谋，在客观上刺激了这一地区文化的繁荣，许多诗人和艺术家纷纷涌到赫拉特，希望在沙哈鲁的庇护下，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赫拉特城也因此成为“帖木尔文艺复兴最灿烂的中心”之一。^①

特别是维吾尔人，因为历史和文化上的关系，而成为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尔王朝时期最为活跃的民族。俄国学者巴托尔德（B. B. BaptoId）在谈到 14～15 世纪中亚政治情况时曾指出：“在文明的人们中，穆斯林（尤其是塔吉克人）和维吾尔人，不仅在本族，而且在所在的国家管理国家大事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当地的王公贵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②

成吉思汗的第十三代后裔阿布尔哈兹·阿拉布莎·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汗（Abulghazi Arabshahh Muhammad Bahadurhan）也曾说：“成吉思汗及后裔所统治的河中地，呼罗珊，甚至伊拉克等地掌玺、尚书、财政官员，几乎都是维吾尔人。”^③

美国学者卡特（Kathe）也说道：“在成吉思汗诸孙的统治下，波斯王国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会计和重官都是畏吾儿（维吾尔）人。”^④

由于维吾尔人的重要作用，在察合台汗国时期形成了以维吾尔语为基础，部分吸收波斯和阿拉伯词汇的察合台语，并将这种语言定为官方语言，通行中亚。甚至到了帖木尔王朝时期，察合台语依然保持着官方语言的地位。维吾尔文人利用语

① [法]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572 页。

② [俄] 巴托尔德《七河史略》，汉文转引自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45 页。

③ 阿布尔噶哈《突厥世系》，汉文转引自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46 页。

④ [美]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127 页。

言上的优势，在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尔王朝时期，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涌现了一大批享誉中亚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像花拉子弥、拉勃胡兹、加尼别克、鲁提菲、赛卡克、阿塔依、朮达依、纳瓦依，他们的创作不仅对后世维吾尔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亚其他突厥语民族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鲁提菲和纳瓦依，他们一扫当时文坛崇尚使用波斯语进行创作的风气，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运用察合台语（维吾尔语）进行创作，使维吾尔文化不仅得到了广泛推广，也极大地提升了维吾尔文化在赫拉特的地位。

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大约在 1439 年之前，有一个叫哈桑·喀拉·沙依勒·谢米斯的诗人，在赫拉特城获得了一部诗稿。从书中他知道这部诗稿是昔日喀喇汗王朝维吾尔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回鹘语创作，完成于 1069 年左右，距他发现的时间已经有 370 年的历史。

维吾尔人在中亚不是默默无闻的民族，他们曾经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创造过辉煌。

喀喇汗王朝是维吾尔人 840 年左右从蒙古草原西迁中亚后建立的，维吾尔人希望在中亚这块土地上重振昔日漠北回纥（回鹘）汗国时期的雄风。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维吾尔人在公元 960 年左右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国家。他们在公元 999 年 10 月攻进了阿姆河以南波斯人建立的萨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城，囚禁了萨曼王朝的国王马立克，彻底结束了波斯人控制中亚的历史。

维吾尔人以新的征服者身份君临中亚，但他们不是愚昧残暴的统治者，他们给中亚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鹘（维吾尔译音），一个强大的突厥系民族，不仅善于战争，也善于同周边

民族和睦相处。”^①这个深受中国中原文化影响的生机勃勃的民族，决心将中亚建成维吾尔人的乐园，并将它重新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在自己的封号上常常冠以“桃花石”（中国）称号，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东方之王。

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获得在中亚的稳固统治，仅靠武力征服是无法长久的，必须扩大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利用文化的变革和政治的革新，改变突厥族人在中亚的地位。自从突厥汗国从中亚失势以来，突厥语民族在中亚一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被迫充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奴隶雇佣军，成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政治争斗中的牺牲品。

因此，这支被认为是突厥语民族中最具文化活力的民族，开始掀起一股中亚突厥化的文化狂飙。各地的学者在可汗崇尚知识和优待学人的政策感召下，纷纷涌到王朝的都城喀什噶尔，在那里潜心学问。经过努力，喀喇汗王朝不仅成功地削弱了波斯文化在中亚的影响力，使中亚完成了突厥化的转变，并且培育出崭新的灿烂的维吾尔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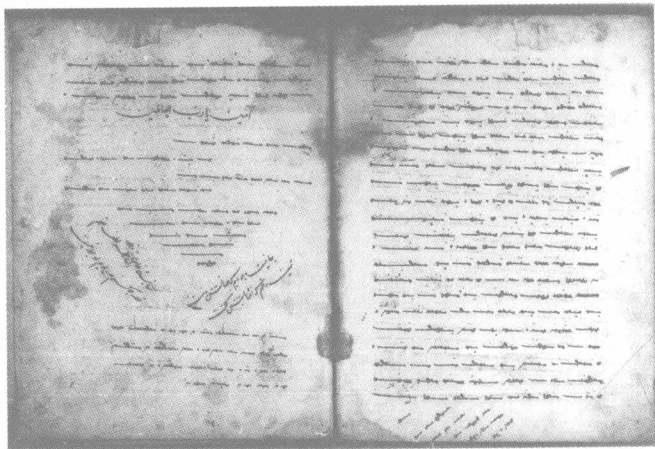
当喀喇汗王朝幻想继续在中亚发挥作用的时候，1221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破灭了他们的梦想。喀喇汗王朝覆灭了，蒙古人占据了中亚，波斯文化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喜爱而卷土重来。维吾尔人在此期间创作的许多标志文化成就的著作突然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且好像寻无踪迹。

现在，谢米斯似乎摸到了沉睡了几百年的喀喇汗王朝中期维吾尔人的文化脉搏。谢米斯通晓当时喀喇汗王朝使用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这种语言和文字就是回鹘语和回鹘文。回鹘语就是古代维吾尔语，回鹘文就是古代维吾尔人使用粟特字母拼写

^① [德] 勒柯克《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维吾尔语的文字，它们的得名，是因为创制和使用这种文字的维吾尔族名被当时的汉文音译作“回鹘”。

获得这份手稿，一定让谢米斯兴奋不已。这是一部充满维吾尔人文化意识、希腊政治哲学、阿拉伯伊斯兰精神和中国伦理智慧的书稿，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和如何发展文化的治国方略，其冷静与沉稳，睿智与精辟，也一定令他激动和亢奋。他决定将手稿的阿拉伯文重新转写为回鹘文，恢复原著的本来面貌，以增强突厥语民族在赫拉特城的自信和威望。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在1439年完成了转写工作，他使这部已经被人遗忘多年的书稿重见天日。



回鹘文《福乐智慧》手抄本（奥地利维也纳皇家图书馆提供）

谢米斯的这个抄本，在1474年，被一个叫法纳里·奥格里·卡迪·阿里——据说是学者的人从土耳其的托卡特城带到伊斯

坦布尔，这说明抄本受到了突厥族人的重视，已经从赫拉特城流传到了托卡特城。阿里把它卖给了据说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一位文职官员阿卜杜勒·热扎克·巴赫希。

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国家机构中，为了保持与其他突厥领土之间的联系而设置了通讯联络处，负责处理各种特别文书并搜集各种情报。很多文书和情报都是用回鹘文起草的。在联络处任职的文书官员被称为“巴赫希”，据说他们的博学程度比那些学者还高。

据土耳其著名语言学家 R. R. 阿拉特考证，受赠《福乐智慧》回鹘文手抄本的阿卜杜勒·热扎克就是在奥斯曼帝国法蒂赫苏勒坦·穆罕默德时代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书记官。阿卜杜勒·热扎克所处这种位置是最有可能接受有关反映维吾尔人文化情况资料的。特别是被认为是整个突厥民族文化成就中最突出、最成熟的这部作品，对奥斯曼帝国的意义极为重要，作为书记官的阿卜杜勒·热扎克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据说，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对于搜集有关回鹘文文献和阿拉伯文文献的工作非常重视，当时还有一批回鹘文和阿拉伯文文集藏于该地的阿雅索菲亚图书馆，包括维吾尔人用回鹘文创作的另一部劝谕诗《真理的入门》。^①

至于阿卜杜勒·热扎克的确切身份，目前还没有详实的资料，无法对以上的推测进行判断。总之，这个阿卜杜勒·热扎克一定是精通回鹘文的，也一定对回鹘的历史与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否则，不会有人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抄写《福乐智慧》，并千里迢迢地送到他那里。阿里决定把抄本卖给阿卜杜勒·热扎克，一定是相信他有能力鉴赏，并保证抄本能够获得必要的

^① [土耳其] R. R. 阿拉特《〈福乐智慧〉土耳其文译本导言》，参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

重视和妥善的保管。

但令人不解的是，有关这部书稿的音讯，到此戛然而止。我们不知道阿卜杜勒·热扎克是否将它转交给奥斯曼帝国的有关部门，也不知道在奥斯曼帝国是否有人负责研究这部书稿。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将视线转移扩展到欧洲，希望追寻东罗马帝国向东进占安纳托利亚的旧路，溯源而上征服希腊等国的时候，土耳其人应该特别看重这部充满希腊智慧的治国方略。因为这不仅可以使土耳其人熟悉希腊智慧，在征服以希腊文化为根基的欧洲地区时，做到知己知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可以熟悉并掌握突厥语民族的文化如何与希腊文化相交融的思路和途径。

但是，看来这部书稿没有受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官方应有的重视。也许他们认为这种纸上谈兵的东西于现实没有多大用处，否则，产生这部手稿的喀喇汗王朝怎么会被蒙古人打败而俯首称臣呢？不管怎么说，书稿进入了土耳其，然后便如石沉大海，莫知踪影了。

岁月真是无情，一晃又过去了 300 多年。那部手稿依然不知被尘封在何处。

谁能想到，这部手稿的再度复出，竟与拿破仑征服东方的计划联系起来。

拿破仑一直幻想拥有亚历山大大帝的荣耀，他不甘心只是站在欧洲的土地上，他的眼睛一直紧盯着辽阔而神秘的东方。他在 1798 年，率领 328 艘战舰，38000 名军人，从法国土伦出发，气势汹汹地直奔埃及。他的军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很快便将埃及制服。

拿破仑住进了开罗，但这并不是拿破仑的终极目标，他的野心是还要拥有印度。当时的印度处在英国的控制之中，击败

英国，拥有印度，那才是拿破仑梦寐以求的。但他意识到，要探寻遥远的印度，总是不得不首先穿越伊斯兰的领地。因此，了解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寻求与伊斯兰文化的调和，是法国人在东方获得稳固地位的基础。

拿破仑早就对东方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所以，出征埃及时，他挑选了数十位“饱学之士”随军出征，他想通过他们的研究，获得一个清晰的东方概念。他坚持认为，只有了解了东方，在东方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将东方控制在股掌之中。这些学者在埃及发现了用埃及和希腊两种语言的三种文字体系——象形文字、通俗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草写体）和希腊文字——雕刻而成的“罗赛塔碑”。由于有希腊文做参照，得以解读那些尘封了2000多年的古代埃及文字，终于找到了揭开古代埃及文明的钥匙。其后法国各类科学家如痴如醉地扑在尼罗河肥沃的土地上，四处寻觅古代遗迹和文物，他们的发现，使埃及古代文明重见天日。法国人的意外收获，刺激和鼓舞了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学者也更加积极地加入到东方文化的考古和研究中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东方学研究热潮。

东方所以受到欧洲人重视，是因为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但是，东方学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实际上，东方学在当时的立足点是想通过对有关东方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以获得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的经验和知识。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所以，东方学才以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而受到空前的重视。欧洲的主要国